

实际上,“合作共赢”是中国向世界提出“一带一路”规划后一直强调的理念,可是欧盟以及欧盟核心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此反应并不热烈,甚至利用各种在它们看来合适的机会放话反对。这说明,中欧双方对“合作共赢”的期望值以及内容是有差异的。

如何在欧洲推动“一带一路”?

曹辛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去年,当笔者和圈内的朋友讨论“一带一路”在北线、特别是在欧洲的困境时,头脑灵活的圈内朋友建议说:“问问他们(欧洲官员),大家搞合资公司,合起来挣钱行不行?”“一带一路”北线的欧洲部分,确实曾经很难推动。

不过日前结束的李克强总理访欧,使事情有了不小的变化。李克强总理对欧洲的此次访问,其最大的收获不在于中国和欧盟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而在于中法共同发表的《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以及李克强提出就受到奥朗德总统热烈响应的“中法共同基金”。因为它折射出了中国落实“一带一路”规划必须遵循的一个方法论,这就是以合资、合营的形式让渡部分利益,继而实现合伙牟利的原则。

实际上,“合作共赢”是中国向世界提出“一带一路”规划后一直强调的理念,可是欧盟以及欧盟核心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此反应并不热烈,甚至利用各种在它们看来合适的机会放话反对。这说明,中欧双方对“合作共赢”的期望值以及内容是有差异的。

中方的一种观点认为:你经济不好,我中国在你那里投资搞基础设施项目,给你互联互通,你的基础设施因为我的投资得到了改善,也能增进你的经济发展,这就已经是“合作共赢”了。可是几个世纪以来极其善于把外交和商业结合的欧洲人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告诉笔者:在欧洲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我把市场让给你,而且你这一来就要呆下去了,那我得到的好处应该更多。

而且,对“一带一路”规划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欧洲有自己的判断。一位欧盟核心国家的外交官曾经问过笔者:“一带一路”是政治考虑多?还是经济考虑多?特别是,既然你是用举国体制来推动“一带一路”,说明你有迫切性,那我就要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好处。中欧双方对“合作共赢”的不同理解和立场差异,使得“一带一路”在欧洲一度很难推动,而欧洲推不动,也就没有“一带一路”。

然而李克强近日对法国的访问,解决了这一分歧,这就是以让渡利益的合资、合营形式来实现合伙牟利。

欧盟戒备“一带一路”?

实际上,李克强此次访问欧洲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新背景是:欧盟正在设立一个总额达3150亿欧元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目的是通过投资,促进欧洲的经济复苏。而在当



前中国正在举国开拓“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这个基金就显得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一带一路”的实质就是:以投资为主导,向国外输出中国的产业、技术和资本,而欧洲就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北线,也是目的地。这个基金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是有交集?还是冲突?

根据德国驻华大使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透露出来的信息,欧盟希望雄厚的中国资本循下列四个渠道投资:成为“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项目筹措资金;加入“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担保基金;加入各种合伙经营的投资平台,例如运输业的基础设施;购买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的债券,这个银行是“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主要出资人之一。由此可见,虽然他们提到希望引入中国资本,但对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却只字未提。

消息来源还告诉笔者:欧盟希望中国以美元或欧元投资,不考虑人民币投资。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因为那样一来,当年“马歇尔计划”的一幕就要重演。就是说,这个“欧洲

战略投资基金”迫切希望引入中国资本,但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规划,至少是有所提防的。而且从根本上讲,这3150亿的投资计划,本身就会使中国失去一些投资机会,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设立这3150亿欧元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动机值得关注。

对此,李克强此次在中欧工商峰会发表演讲时,也对中国的立场进行了明确的表达,用通俗的语言归结起来则是:

中方愿意加入欧洲战略投资基金,但是你不能只找中国要钱而不要中国的队伍、技术和管理(当然包括基础设施项目);中国也希望和欧盟在第三方搞合作,而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搞的“一带一路”项目,性价比高、竞争力强是事实,但是也会采购你欧洲国家的高级设备和技术。

此外,中国愿意加入欧洲产业投资方面的金融合作,但是除了购买你的国债、直接投资、购买欧洲投资银行债券等方式外,中方更倾向于设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来助力欧

洲战略投资基金。当然,要允许中国用人民币投资。

对于这个共同投资基金,我们从李克强访欧前路透社的报道中特别提到“这个基金本质上属于欧洲的基金”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克强提出设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的背景。

然而,从最后中欧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来看,除了双方约定在今年9月举行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上“探讨”这一“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外,其他均没有什么细节。特别是李克强访欧前,路透社信誓旦旦地报道说:根据该机构看到的中欧峰会的公报草案,中国将注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金额以“数十亿美元计”。但现在看来,这没有成为现实。

而且,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在当前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都有钱赚才能“共赢”

然而谋事在人,鉴于欧盟的态度,李克强换了一个做法,在法国那里就获得了成功。李克强在访问法国时提出关于双方合作在第三方共同发展的设想,当场获得奥朗德总统的热烈回应。“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奥朗德说。6月30日,在中法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在随后的共同会见记者环节,李克强的讲话尤其说明问题:他说“中法在第三方合作领域达成共识,将会调动更多发达国家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中法关系继续走在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前列,并迈出了新的一步。”此外在“共同投资基金”问题上,在爱丽舍宫的会谈中,中法双方刚刚谈及“中法共同基金”的合作,法国总统奥朗德就迅速作出回应:他指着坐在身旁的法国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长就在这里。从今天开始,我们两国就要针对这一基金,开展具体沟通协调工作。”

实际上,还有一件值得高度关注的事件。就在李克强此次访欧前的6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布达佩斯同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6月6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同欧盟成员国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合作文件,欧盟的口子已被撕开了。《华尔街见闻》的报道说,王毅在签字仪式后表示,两国应共同努力,推动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与匈方“向东开放”政策的战略对接。

王毅还期待以签署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为契机,使匈牙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在欧洲的重要支点;以共同建设匈塞铁路为契机,使

匈牙利成为欧亚物流的重要枢纽;以增强两国高度互信为契机,使匈牙利成为中欧友谊的重要桥梁。

在中匈、中法之间的高度默契下,欧盟的迟钝则显得有些跟不上趟了;而一直对“一带一路”迟迟不表态的欧盟大国,也发生了巨大的裂变。这一变化显示,在落实“一带一路”规划的过程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面对外界的一片疑虑时,以合资、合营的形式让渡部分利益,继而实现合伙牟利的方式,是个打消疑虑的有效办法,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背景下,一家牟利,几乎很难有胜算的把握。

事实上,在笔者和圈内朋友讨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策略时,大家甚至认为:以高铁和核电为例,在德、法各找一家大企业,中方与之组成合资公司,共同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进行投资,共同获利。笔者随即同欧洲外交官就此种选择进行了探讨,对方一反常态地正面肯定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几乎可以确信,下一个即将和中国共同牟利的欧洲国家是德国。消息来源说:德国近年有意在捷克西里西亚地区建立工业园,而中国对在这一地区发展也有兴趣,双方一度还有矛盾;德国驻华使馆也曾以“中国在欧盟投资必须遵守欧盟法律”来回笔者对此问题的咨询。现在,双方不妨照合伙牟利的模式合作。而且德国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在欧洲均属第一,而且政治上双方关系也不错,属于基础很好的案例。

还有,此次中法之间的合作还呈现出这样一种重要趋势: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规划过程中,当面对某个地区性国家组织时,与该组织内的单个国家合作比与该组织合作似乎更重要、而且更容易成功,例如这次法国和中国的关系,就走在了欧盟与中国合作的前列,反过来也一定会推动欧盟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一带一路”规划在北线均要经过一系列地区性国家组织的地盘,例如中亚就属于欧亚联盟的范围。中匈、中法之间的合作显示,面对此种格局,先同该组织内单个国家、特别是核心大国合作,以个别撬动全体,这似乎是个可行的办法。

欧盟一旦被撬动,隔在中欧之间的国家必将发生如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般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一带一路”规划的北线便可以期待了。钱,一定要大家一起赚。李克强此次对法国的访问,实际上实现了一个推进“一带一路”的方法论。

(注:作者为外交部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曾参与相关问题的研究。)

2015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基本分析

经济学家周保

(上接 01版)

微观上,在创新周期,现在经济低谷的时候应该加快创新,加快重组,加快研发,包括互联网+都需要思想解放,一定要制定一个清单——民营企业负面清单,国有企业正面清单,而且动态调整;国有企业能干的工作要有规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定这么一个原则,凡是民营企业能做的事情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做,只有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才由国有企业做。然后动态调整,只要这个领域民营企业能做就让给民营企业做,国有企业做那些民营企业做不了的事情。这个领域我们有很多可以改的空间,包括PPP。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边竞争性领域大量的国有企业争大钱,民间资本进到这些准公共领域不盈利或者薄利、微利,甚至无利可图的领域,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想让民营企业进到PPP,首先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领域。PPP很大的问题,“假民营、真国企”这都是需要改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我是主张使用中国版的QE,但是要把好三道关,财政部给额度的时候应该鼓励地方改革搞得越好、企业重组包括国有资产出售做得好的地方,应该优先给(它们)额度,要鼓励地方改革;金融机构买的时候也应该先买一些财务透明、改革做得好的地方债券,央行在后面应该实行一个中国版QE。

在金融改革方面。我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商业银行的去国有化,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进来办民营银行。还要加快国有银行的去国有化,这个事情必须走。最大的关联交易是我们的各级政府控制着各级商业银行,然后控制着它们的高管,然后把资金贷给政府项目;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效益就存在很大问题。所以,必须打破的链条就是商业银行的去国有化。

另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决策的规范性问题及透明度的问题要引起重视。当我们准备加入SDR、发展亚投行等做法,对国际是一种正的外溢效应的时候,大家皆大欢喜;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对外部世界是一个负的外溢效应的时候,将来我们就会面临全世界的指责。如果一个政策不能问责的话,就可能无法保证其科学性。今天这个时

候,当前这个经济形势最重要的是加快改革,只有加快改革才能真正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和消费者的信心。

■贾康:下半年安排四位发言人,现在欢迎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黄剑辉院长发言。

■黄剑辉:大家好!刚才魏加宁副部长(编者注:魏加宁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前副部长,现为巡视员、研究员)作了非常精彩的报告,他反复提到两句话,“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也是对未来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改革方面改革的一个新的思索,标题是《加快试点股田制,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基于几点考虑,一个是,习总书记讲过,如果没有农业、农民、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中国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方面也是社会进步趋势的必然要求。农耕文明的时候,曾经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追求,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提出耕者有其田;迈向工业文明知识经济的时候,应该走向劳者有其股,劳动者都有他的股份,转向这么一个新的追求。第三,去年在开莫干山中青年论坛30周年会议的前期和会议期间,国内不少学术界 senior 级的人物,还有中青年学者都对土地制度改革做了很多的讨论,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但是观点一直不一。第四个背景考虑大概是一个月前,我联系的几个北京的智库,他们曾经商议在最近搞一次专门研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研讨会,我个人也有这个情怀,但是那个会议推迟了。我把我的研究成果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五方面,近日跟贾康院长还有魏加宁副部长我们一起参加了“新巴山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郑新立主任反复强调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和三农的发展对中国的重大意义。

我发言的主要内容:第一,从四个方面分析一下我国农业面临什么瓶颈。第二,从两个维度、从中国三四千年来土地制度变革演变的历程——有本书叫《土地制度改革五千年》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脉络。第三,从国外主要国家——世界主要的国家有哪些农业发展的模式可以借鉴。以此为基础,经过横向、纵向两个维度的分析,对中国未来如何推

动农业现代化提出一些建议。从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首先我们从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农业科技的贡献率,还有农业生产能力、产业化的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指标把国内的水平与国外水平进行对比,可以看基本的结论就是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高;从产值和单位面积的产出方面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刚才谈农业,再看三农问题的“农村”。我们国家农村总体上表现为缺乏总体的规划,城市规划固然不是理想,但是还是有规划的。我们国家的乡村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划的。也有人用两句话来形容我们当代的中国,就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是一种很尖锐的批评。所以,基础设施方面也很滞后,尤其是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很紧缺,条件非常差。我在几年前访问了赞比亚以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赞比亚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但是它的校舍相对于政府大楼和居民的房子是最好的,而且是国家统一配发的校服。但我国的教育现状是,很多中小学校的校舍还很破旧,说不过去的。我们为孩子们的提供的教育的设施还很不足。

另外一方面,从现在有关的土地制度方面安排也是比较扭曲的。第一,家庭联产承包制1978年推出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相对人民公社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已经很难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第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也面临平等与效益之间的复杂的两难问题。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也使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土地供应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很大的矛盾。第三,农业的兼业化、副业化、老年化的趋势突出,因为很多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向城市流动,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口呈现老龄化的一个趋势,也不是很专业化。农产品竞争力不断的减弱,危及了产业安全。

在新的瓶颈下如何应对,有四点思考:第一,如何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推进的大环境的情况下,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促进农民的增收?第二,如何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第三,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质量安全,提升农业科技持续发展能力?农业是我们每天衣食住行,食品是首要的问题。第四,如何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



的改革和配套的改革建立相应的新的体制机制,实现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创造条件?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命题。

首先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改革的演变。首先,在商鞅变法之前,中国实行井田制,古代的一种国有制,这种国有制是奴隶社会条件下的国有制——土地是周天子的,天子拥有全国的土地,用相当于承包经营的方式分给奴隶主,奴隶主再去找百姓去雇工。为什么叫井田?两层含义,一个是田地是由道路和水渠分开的,成为一个井字。第二层含义,它是把土地,如果按900亩来分的话,因为井字就是9,中间那一块,每一块是100亩。那800亩是分给8个奴隶主来找雇工耕作,井字中间的100亩由8个奴隶主雇的人来种,种完以后收获全部归天子。到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道路,实行规模化,可以转让,无论是奴隶主也好,平民也好,去开荒开出的地可以为自己所拥有。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的规模化。

随后的几千年土地制度不断的演变,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提出要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后来国共两党都是围绕这么一个目标,但是国民党没有很好的推进,只是退到台湾以后才搞土改。我党在1946年以后,一直到1956年贯彻了耕者有其田,搞了合作社,还是那段时间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是1958年搞出来的,把农民的土地变相剥夺了——公有制的名义把农民的土地变相剥夺了,一直到1978年

安徽小岗村推动上一轮改革才恢复了一些以承包权的名义。魏副部长说国有银行去国有化的进程,土地其实也是一个去集体化的进程,让农民拥有了更多的承包经营权。

回顾历程,找到不少的启示。近几年来中国各地也推进了一些模式的土地的改革,包括天津的宅基地换房,重庆的地票模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好像没有像1978年小岗村废除人民公社搞土地承包制对整个农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革命性的作用。

整个历程的启示有这么几点。第一,土地制度需要因时而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而且不应该全部一刀切,因为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第二,要让农民对土地拥有相对完整的产权,加快推进土地的灵活流转,减少行政干预。第三,土地政策的设计要经过深入的实际研究才能推进。第四,农业的发展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降低税负等方面,保护农民的权益。第五,因为如果要搞农业的现代化,没有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三五亩地搞现代化。所以,怎么实现规模效应,集约化耕作,商品化生产,五企业化经营、金融全方位支撑是改变小农经济的必然方向。

看一下国外几种模式。从全球来看,决定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工业技术水平三个方面,由这三个方面还有土地规模的大小,这样就形成了大概以下七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即美国模式、日本模式、韩国模式、以色列模式、荷兰模式、台湾(地区)模式、德国模式等。(下转 03版)